



本书接受“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基金”资助

嶽麓書院

於斯為盛

惟楚有材



湖南人底精神

湖湘精英与近代中国

罗 宏 许顺富 著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湖南人底精神

湖湘精英与近代中国

罗 宏 许顺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南人底精神：湖湘精英与近代中国 / 罗宏，许顺富著.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33-2305-5
I . ①湖… II . ①罗… ②许… III . ①文化史—湖南—近代 IV . ① 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6365 号

湖南人底精神：湖湘精英与近代中国

罗宏 许顺富 著

责任编辑：简以宁 冯文丹
特约编辑：陶梦月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阳洪燕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23.25
字 数：329千字
版 次：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305-5
定 价：6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罗宏，男，1954年生。南京大学文艺学硕士毕业，广州大学教授。评论家、作家。获广州市优秀专家称号。出版发表论著、论文、文学作品约二百万字。影视作品约四百部（集）。作品获国家、省、市政府奖十余项。2014年长篇小说《骡子和金子》有较热烈市场反响，转让五项版权，销售量数十万册（含电子书）。

许顺富，男，1963年生，华东师大近现代史专业博士毕业，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硕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湖南首批“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21”人才工程培养对象。开创湖南绅士群体研究新领域。在海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论著《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绅士与晚清文化变迁》、《政坛不倒翁谭延闿》等多部。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三项。

广州大学文学思想中心资助

序

文选德*

晚清以来的百年间，湖湘英杰人物井喷式地涌现，堪称奇观。湖湘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英杰人物的历史作为而为世人关注，从而彰显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说，湖湘英杰既是湖湘文化哺育的结果，也是体现湖湘文化辉煌的显著标志。尤其是近代以来，湖湘文化对历史和民族的贡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英才辈出。因此，研究近代湖湘英杰与研究湖湘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本书作者就是抓住这种关系展开研究，体现了作者对湖湘文化的深度理解。这也是本书的新意之一。

对于近代湖湘英杰的研究，学界大都着眼于业绩，例如，建构了湖湘学派，创造了咸同中兴的历史局面，开洋务运动之先声，平定边疆外敌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以及维新变法等等，而探讨这些湖湘英杰群体形成轨迹的研究并不多见，甚至可说是空白。晚清以来，社会经济并不发达，政治区位也比较偏远，地理环境相当封闭的湖南，为什么会井喷式地涌现群星灿烂的政治家群体，担当起左右中国方向的历史使命，创造一系列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这的确是个历史之谜。本书作者从清代社会政治大背景，湖湘乡土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湖湘英杰的思想资源，以及岳麓书院的教育摇篮作用等方面，展开多元综合考察，将湖湘英杰

* 文选德，知名湖湘学者。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群体的形成归结为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这种多元视角的观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的思想方法，也抓住了近代湖湘英杰群体形成的关键因素。据我所知，对近代湖湘英杰的形成从社会政治背景、乡土文化背景、思想资源背景和教育背景综合考察的论著为数不多，因此本书具有相当的开创性。

在此基础上，作者还以专章对陶澍和贺长龄、曾国藩和左宗棠、谭嗣同和黄兴为代表三代湖湘英杰群体的代际差异和文化特点展开了分析，许多观点别开生面。比如第三代湖湘精英群体与前两代比较显出较为复杂的情况，即保守与革命的并存现象。给人的感觉是湖湘文化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型。作者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代湖湘英杰群体虽然有时代新变的一面，但并不是突变，也并没有改变湖湘文化的基本内涵，从更深层的文化性格看，无论保守或革命，依然是湖湘传统文化性格的赓续，保守派和革命派均是湖湘文化的孪生子。也就是说，经世致用为思想特色的湖湘文化，是以经世需要为道路取舍的标准，保守与革命都依据经世效果为决策，对湖湘英杰而言并没有价值信念的选择障碍。这样的分析，看到了湖湘文化历史传承的延续性而没有被表象的断裂性所迷惑，对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湖湘文化的内质，是有独到眼光的。此外，对代表性的湖湘英杰人物，作者的一些分析也富有趣味。比如对于贺长龄的历史地位，作者根据史料分析，将他提升到与陶澍并立的高度；对于左宗棠的分析，也依据史料将其和曾国藩对照，指出是两种湖湘文化人格的代表之一；还有对罗典的评价，作者综合史料，提出了罗典书院时代的概念，将罗典和两位弟子袁名曜、欧阳厚均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符号人物，标举岳麓书院最辉煌的教育业绩和教育时代。这些观点不仅富有新意，更富有启迪。总结湖湘文化，固然要依据史料，包括发掘新史料，但如何观照史料也很重要。由于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种种变迁淘洗，历史的史料无论怎么丰富，和历史进程的无限丰富性相比都是有限的，史料缺失是史学研究的常态，仅靠史料来还原历史往往是很困难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者对有限史料的解读，这就要考验学者的史学功底了。我认为，史学功底是衡量学者水平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本书就史料的新发现而言并不突出，基本上都是依据已经开掘的史料以及前人的研究，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在耳熟能详的史料和观点中不乏独到的发现或者说见地，尽管他们的观点我并非全都认同，却很欣赏作者的探索精神与史学功夫。学术研究要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即使有些观点不成熟也没关系，真理和真知总是在不断的探索和讨论中确立。如果本书能引起学界

的关注和讨论，推动对湖湘文化研究的深入，则是我所乐见的。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湖湘子弟，天然受到湖湘文化哺育，对湖湘文化也有浓浓乡情。许顺富教授是近代史的博士，二十多年研究近代史，尤其在湖南绅士研究领域耕耘很深，著有《湖南绅士与近代湖湘文化变迁》《谭延闿政坛不倒翁》等多部专著，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知识基础。罗宏教授专业是文艺理论，而立之年走出湖湘，到了岭南，成为广东的知名学者、评论家、作家，也是颇有建树。还值得一提的是，罗宏父母家族均为近代湖湘显望世家，先人中不乏湖湘英杰，他七世族祖便是著名岳麓山长罗典，五世伯外公便是主编《皇朝经世文编》的著名经世派领袖，云贵总督贺长龄。这种家世背景，激发他投入到湖湘文化的研究中，从而使本书字里行间透出特殊的情感温度。我还得知，罗教授的姨妈贺延祐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姨父欧阳继统在大革命时期就读中山大学，是广东知名的学运领袖，抗日战争时期在我的家乡石门和友人一起创办了九澧中学，也是我的母校，于是和罗教授又有了一种亲和感。当罗教授请我为他们的新著作序之时，便欣然接受，匆忙中写下了如上不成文章的文字。

权且为序。

文选德

2016年6月16日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形成的历史大环境

- 第一节 文化冲突中的投诚与招安 / 1
- 第二节 文化投诚中的虚心与杀心 / 7
- 第三节 贵族统治阶级的执政力退化 / 13
- 第四节 晚清的乱世生态 / 22

第二章：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形成的乡土社会

- 第一节 湖湘的地缘社会生态 / 33
- 第二节 楚文化底色对湖湘民性的影响 / 40
- 第三节 移民传统与湖湘绅士的社会影响 / 45
- 第四节 乾嘉苗民起义的社会影响 / 53

第三章：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思想资源

- 第一节 宋代的湖湘文化大开化 / 63
- 第二节 王夫之的诞生 / 75
- 第三节 王夫之思想述要 / 84
- 第四节 王夫之的湖湘文化影响 / 101

第四章：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教育摇篮——岳麓书院

第一节 湖湘学基地与岳麓学统 / 111

第二节 王夫之和岳麓书院 / 125

第三节 清代岳麓书院的辉煌 / 128

第四节 罗典书院时代 / 134

第五节 湖湘英杰与岳麓书院 / 153

第五章：嘉道年间湖湘政治精英集团的形成

第一节 嘉道年间的湖湘政治精英群体 / 159

第二节 陶澍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 / 168

第三节 贺长龄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 / 176

第四节 魏源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 / 190

第六章：咸同年间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兴盛

第一节 乱世崛起的湘军集团 / 199

第二节 湘军领袖曾国藩 / 203

第三节 继往开来的左宗棠 / 216

第四节 湘军对历史的改变 / 226

第七章：湘军知识精英集团的文化建构

第一节 东西方文化的时代冲突 / 238

第二节 湘军集团的礼教文化重建 / 245

第三节 湘军集团的分化和没落 / 259

第八章：光（绪）、宣（统）年间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新变

第一节 湖湘维新派精英群体的形成 / 274

第二节 湖湘宪政派精英群体的形成 / 284

第三节 湖湘革命党群体的形成 / 290

第四节 令人回味的文化启示 / 295

第九章：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文化启示

第一节 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文化属性和时代条件 / 308

第二节 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极致道德情结 / 314

第三节 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保守与革命 / 325

第四节 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宗法性 / 334

尾声 怎样面对先辈的文化遗产 / 344

后记：我与湖湘文化 / 351

第一章：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形成的历史大环境

考察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的形成，首先必须关注相关的历史大环境。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清代以来的政治大环境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种种情势有意或无意间成就了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的诞生和崛起。具体言之，清王朝执政历程中的激烈文化冲突，满族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采取的文化投诚与招安并举的国策，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满族贵族集团与汉族士大夫集团之间微妙的实力消长转换，构成了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崛起的重要社会、政治条件。

第一节 文化冲突中的投诚与招安

一、武力征服与文化的反征服

清朝政府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最后一个中华封建王朝。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曾是古老的游牧民族，西周时称肃慎，西汉时叫挹类，隋唐时称靺鞨，宋朝时叫女真，清朝时称满洲。满洲贵族习游牧，精骑射，长期过着游牧渔猎生活。明朝后期，满洲部落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强大，建立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八旗铁骑，其子皇太极乘着明末内乱，凭借着八旗劲旅，纵横于东北三省，建立了清朝政权，奠定了清王朝的根基。顺治皇帝福临六岁登基，虽是叔嫂合谋的杰

作，却没能力处理国家军政大事，是在母后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的联合辅佐下，成为划时代的雄主，打着为“故主雪耻”，为汉人复“君父之仇”的旗幡，将八旗铁蹄开进山海关，最终实现了祖辈挥师入关、统一天下之梦。

八旗铁蹄席卷南移，迅速打败了兵进京师的李自成农民义军。满洲贵族以明朝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在京城为明朝的崇祯皇帝举行了隆重葬礼，这是一出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希望赢得民心，争取明朝遗老遗少的拥戴。1644年9月，顺治皇帝又将都城从盛京（今沈阳）迁到了北京，企图更进一步地亲和与控制新征服的异族汉民，巩固清朝江山。

清军在不断向南征服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越是汉人文化深厚的地区，抵抗情绪就越强，征服难度就越大，付出的代价就越惨重。对于一个崇尚武力的少数民族来说，最初根本意识不到文化的影响作用，而迷信暴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工具。越是汉人抵抗强烈的地区，清军越加残暴，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屠城惨案。史料记载，仅扬州一城，共有男女老少八十多万人在这场浩劫中遇害。但是，暴力不仅没有镇住文化底蕴深厚的汉人反抗，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平民百姓走上武力抵抗道路。一城城的汉人被杀光了，一城城的汉人又揭竿而起。满洲贵族从这血淋淋的事实中，开始意识到靠一味杀人的暴行，难换来天下太平。

这就是人心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的力量。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曾指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①尚处在封建军事民主化时期的满洲贵族要统治远比自己文明先进得多的广大汉族地区，光靠暴力难以长久，必须找到一种令汉人为我所用的制度。于是，清朝政府在实行武力征讨，确立“重满抑汉”的基本国策的同时，又大力施展对汉族士大夫的怀柔政策。一方面大量留用明朝的遗臣，使他们臣服新主，为己所用，消弭广大汉人的抵抗情绪；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恢复汉人传统的选官取才的科举制度，疏通知识分子的上进渠道，在体制内约束知识分子的言行，使他们由新朝的对抗者转变为拥护者和支持者。所以，清代科举制的推行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的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004年5月北京第5次印刷，第768页。

续，更有着招安汉族文化人的良苦政治用心。

顺治元年（1644）十月，顺治帝就在《即位诏》书中对科举制度作了明确规定：“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凡举人不系行止黜革者仍准会试，各处府、州、县儒学食廩生员仍准给廩，增附生员仍准在学肄业，俱照例优免。”^①1645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在给顺治皇帝所上的奏折中，更明确地阐述了开科取士的重要作用。他说：“近有借口薙发，反顺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处处劳大兵剿捕。窃思不劳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②可见，清朝统治阶级已经深深地意识到，与其使用武力，处处围剿那些反清组织，不如采用安抚手段，通过开科取士的方法，使那些明代遗民尽快进入新的权力秩序之中，自觉地认同新政权。在武力征服与文化反征服的较量中，满族统治者终于找到了一条科举应对之路。

二、开科取士与文化笼络政策

1645年，清政府正式实行科举制度，规定于当年八月举行乡试，次年二月举行会试，科举制度由此成为清朝固定的一项国家制度。清代的科举实行常科、制科与八旗科并行的制度。常科是清代按照规制，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是最重要的科举项目，包括“文科”和“武科”两类，其中又以“文科”考试影响最大。

“文科”考试分为四级，依次是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主要是考生员（即秀才）；乡试是省级考试，每三年一考，考中者为“举人”。会试是国家级考试，考中者为“贡士”；殿试是最高一级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贡士复试合格后才能参加殿试，殿试主要挑选状元、榜眼、探花和进士身份以及职务任命。“武科”考试也大体类似，分为武童试、武乡试、武会试和武殿试四级，考武秀才、武举人、武状元等，但重在比试武艺和军事知识。制科则是不定期举行的科目，清代主要有博学鸿词科和孝廉方正科。八旗科主要是针对满洲贵族和八旗子弟，主要考国语和骑射，以保障满洲贵族的特权。

① 陈文新主编、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② 陈文新主编、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清代的科举考试内容主要以《四书》《五经》为主，向读书人灌输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培养效忠于封建皇权的奴仆是科举考试的主要目的。在统治阶级看来：“老子主无名无为，不利于干涉；墨家创兼爱，重平等，尚贤任能，尤不利于专制。惟独孔学，来等差，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之手段，而达巩固君权之目的，此对当时现实社会，最为合拍，帝王驭民之策，殆莫善于此。”^①这是极其意味深长的。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递交了文化的降表。儒学被满族统治者尊奉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高明的统治术——以文化的投诚换取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既弥补了征服者自身的文化短板，又可以收买世道人心，将叛逆者转化为臣奴。清王朝因此真正得以维持下来。

科举考试采用的是八股文方式，这也是一种富有心机的设计，即每篇阐述儒家经义的论说，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对句子的长短、声调的缓急、避讳的格式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繁琐而僵硬的文体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考生的创造力，因而饱受后人诟病。问题在于，对于巩固政权而言，人的创造力恰恰是要被压抑的。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科举，也许就有更多会心之感。不过，科举考试也不全是消极性的统治术。不以门第论英雄，而以考试成绩较短长，贯彻着以成绩高低为选才标准的公平竞争原则，这就给每一个人通过科举考试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不管门第，不讲年龄，不论财富，在当时是最为公正的选才制度，给了每个读书人奋发进取的希望。加之科举考试又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士人一旦中试成名，不仅官运亨通，良田美宅，娇妻美妾随之而来，而且可以显亲扬名，光宗耀祖，一洗十年寒窗无人问的辛劳。

还必须留意，清代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管理制度，在中央各机关分设满、汉员，各部正、副职也是满、汉分设，表面看来好像是一视同仁，实际上是“重满抑汉”，同级官员以满为尊，官印往往掌握在满官手中，品级也以满官为大，高级军事官员绝大多数都是满人，汉人所占比例极少，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在清代初期绝大多数由满人或蒙古族人担任，武科和八旗科考试主要是针对满人而设。满人比汉人享有更多的社会特权。他们还强行要求汉人改发易服，从形式上培养汉人的服从心理。满族统治者吸取了元朝蒙古人的教训，尽量不去触动汉人

^① 转引自叶晓川：《清代科举法律文化的儒学化》，《科教文汇》2007年9月（上旬刊），第176页。

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体制，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体制。虽然，这种以满洲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管理制度蕴含着种族歧视，但是，在文化旗帜上却书写着儒学的图腾，这就迎合了汉人的文化心理，而且，毕竟在制度上给汉族士人参与大清帝国的管理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满汉之间的隔阂。于是，功利诱惑重树了知识分子对异族皇权的尊敬，无数汉族知识分子渴望通过科举为朝廷效力，不再去考虑这朝廷是何族所创。^①

科举考试对于士人而言是一个漫长的旅程。由于清代科举名额有限，能够连闯四关，科科及第的幸运者毕竟凤毛麟角。按规定，秀才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名或5名。全国秀才名额在25000名左右，举人限额在1500名上下，进士限额在400名左右。举人与秀才限额的比例按规定大体是1/20，但是，如果加上历年落榜的人，20：1的比例就大打折扣，按大、中、小省，分别是80：1、60：1、50：1，淘汰率就十分可观了。参加会试殿试考进士，比例就是30：1、40：1。这种考试都是三年一次，三级考试都能顺利通过，大体要十年的时间，从童生到进士的考中机率大概是百分之几，要是在哪一级上蹉跎一下，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难怪在科场上出现了不少的白发童生和寿星举人。广东顺德人黄章，年近40才考中秀才，60岁补上廪生，83岁被选为岁贡生，康熙三十八年（1699）100岁时从广东千里迢迢到北京顺天参加乡试，一路由曾孙服侍照料。入考场时，黄章在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个大字，留下了“百岁乡试”的科场佳话。广东诸生谢启祚百岁参加会试，角逐进士功名。谢启祚先后有三妻二妾，23个儿子，12个女儿，29个孙子女，38个曾孙，两个玄孙。过着五世同堂的幸福生活，本可尽情享受天伦之乐，但他仍旧以98岁高龄入省参加乡试，本可以以年高获得皇帝恩赐举人，但被其拒绝，结果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果然考中了举人。为此他还特地作了一首老女出嫁的自嘲诗：“行业九十八，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生雪白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女青春女，休夸早好逑。”第二年，他又以99岁高龄入京参加会试，朝廷授给国子监司业衔。这种寿星秀才、高龄举人在科举考试中并不是个别现象。据《光绪会典事例》公布的数字，乾隆元年（1736）赐给参加会试的70岁以上举人五人进士。从乾隆十七年（1752）到光绪

^① 曹猛：《当我们读历史时，我们能读到什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112—113页。

十二年（1886），六朝在150年的会试中，赐给70岁以上举人国子监司业、学正、翰林院检讨等头衔者2224人，赐给各省乡试的秀才以举人和副榜头衔12140余人，^①足见科举考试对士人的强大诱惑力。

科举考试中，还有特殊的门类。对于那些知识渊博，在社会上有较高声誉和学术影响力的士人，清朝统治者还特开方便之门，通过举办制科的形式来笼络他们。1679年，康熙皇帝创办了博学鸿儒科，这是一种通过荐举与考试相结合，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办法，用以吸纳非常之才。3月，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考试，参考人员共143人，试题为一诗一赋：即《省耕诗》和《璇玑玉衡赋》，录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共50人。这个鸿儒群体大多是淡于名利、踏实苦干、清廉自守、学识俱佳的人才，因此，康熙皇帝在迫使他们出山以后，给予了他们很高的礼遇，不仅升迁打破常例，还让他们参与国家的大型文化活动，陪同皇帝出席各种盛典，成为天子近臣，使他们时常感受皇帝重才的诚意，这对清代统治的巩固和化解汉族士子反清的情绪起了重要作用。康熙六十一年，又开设了孝廉方正科，以道德行为作为选才的标准，树立道德标兵，引领社会风尚，营造汉族知识分子尊礼重道的社会氛围。诸此种种，都可见统治者的确在科举上耗费了良苦机心。

钱穆在《国史新论》一书中谈到，在举行科举考试时，“不仅政府与社会常得声气相通，即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合之机会，不仅与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于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②。费正清在谈到清代科举制度的作用时也说：“殿试由皇帝主持，他通过这一仪式扮演了一种‘圣人—教师’的角色而获得众多‘天子门生’的效忠。士子一旦入仕，就会视皇帝为道德的楷模、学术和艺术的恩主，所以对于清朝最高统治者而言，真正的考验为他们是否能胜任这一角色，从而使国家和文化在‘天子’的统治下保持统一。统治中国不仅需要政治和军事上的手腕，同样还需要文化上的领导能力。”^③

清朝统治者正是利用了科举考试这一有效的工具，确立了大清新朝的国家意识形态，聚合了全国知识分子的能量，沟通了全国各地知识分子的文化交流，

① 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9—12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59页。

③ [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